

# 五四文学思想论稿

方习文摇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 目 录

五四现代文学批评总论（代前言） .....	（1）
陈独秀：文化启蒙与文学革命的先锋 .....	（10）
胡适：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思想的构建 .....	（15）
胡适：现代小说观念的开拓与建立 .....	（17）
鲁迅：三篇文论细读 .....	（18）
周作人：“人”的发现与“人类”的乌托邦 .....	（19）
茅盾：走在“人”的文学到“为人生”文学的途中 .....	（20）
郭沫若：从“自我表现”到“革命文学” .....	（21）
成仿吾：对现代文学批评的独特贡献 .....	（22）
郑振铎：五四文化精神的承接与探索 .....	（23）
郁达夫：自我情感的“真”与“美” .....	（24）
闻一多：“为艺术”与“为人生”之间 .....	（25）
梁实秋：“不合时宜”的新人文主义者 .....	（26）
附录一 摇同道异求：梅光迪和胡适的交往与文学论争 .....	（27）
附录二 摇被忽视和误解的安徽作家章衣萍 .....	（28）
附录三 摇《孔乙己》：文化宿命的悲剧意味 .....	（29）
后摇记 .....	（30）

## 五四现代文学批评总论（代前言）

朱寿桐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传统》一文中，从文学史研究的高度，概括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思想范式，建构了科学有效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认知系统。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自‘五四’时代起就分别从思想观念、思维取向、艺术形式及创作方法等方面建构起了区别于文学旧传统的基本范型，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基本‘轴心’，同时也因此决定了‘五四’时代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正式起点的性质。”<sup>①</sup>现代文学批评，在这一思想范型建立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道法体系”。

但是，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与建立一开始就呈现这样的特点：既出诸对传统的反叛又呈现出新的现代体貌，同时也没有离开对于传统的尊重和依赖；既被西方文化催生，甚至表现出相当的心仪，甚至因文化焦虑带有粗放浮躁的借鉴色彩，但是毕竟经过了选择、转化与创造；在现代知识分子走向“公共空间”的过程中，他们会以某种群体的形式（刊物、社团、流派等）追求某种共性的价值观念，但是，主体性差异又使他们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所以“历史事实”或者说“话语本身”显然要丰富复杂得多。

—

清朝末年，尤其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就日趋明显，文学的现代转型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时代和环境的巨大变化，使国内形成了一种能够容纳外来文化，努力建构新型文化的新的文化语境，并为新的文学思想和文本样式

<sup>①</sup> 朱寿桐《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传统》，《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 5期，第 85页

的产生与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sup>①</sup>。其意义不仅在于为中国文学由古典走向现代提供了契机，还在于使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体系的创立成为可能。

从龚自珍充满叛逆和忧患的诗文到梁启超“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的呼号，中国近代启蒙主义思潮的形成历经半个世纪<sup>②</sup>。“五四”前夕，先进的知识分子以面向世界的眼光和反对封建道德的目的，继续推动着近代启蒙运动的发展。在这一情势下，批评家们开始艰难地告别古典批评，努力建构适应时代变化的新的批评话语，成为现代批评的先导。

在这一过程中，梁启超和王国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梁启超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参照系从事批评实践。他的《饮冰室诗话》，几乎就是诗界革命的理论阐扬和总结。作为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着眼于文学的社会功用，执著于用政治道德作为衡量文学的标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他的纲领性文字。他将“新”小说看做是“新民”的前提，极力鼓吹小说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并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沿着“兴国”必先“新民”，“新民”必先“新小说”的思路，建构起他独特的话语体系。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继承的仍是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只不过这个“道”已被悄然置换为启蒙主义的政治理想。梁氏所开创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一命题，成为影响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元命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正因为如此，郭沫若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中说：“文学革命的滥觞应该追溯到满清末年资产阶级革命觉醒的时候。这个滥觞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梁任公”。<sup>③</sup>

“如果梁启超集中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显示了政治型批评家的夺目光彩，那么，王国维则主要由在中西文化冲撞的背景下对文学与民族文化心理的研究探寻而给后世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卓见，大体显示了学者型批评家的特立超拔”<sup>④</sup>。

王国维极言文学的独立价值，标举文学“超然于利害之外”的本性，推崇重视人格判断的伦理学标准。他的《红楼梦评论》，运用欧洲的现代哲学、美学理论，提出了“为人生”的文学观念。在王国维思想中，“人生”并非只关个人，它实际涉及家庭、国家与社会乃至人性，即所谓“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

① 李继凯《“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创造》，《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

② 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4年，第 1 页

③ 麦克昂《文学革命之回顾》，《创造社资料》（下），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年，第 134 页

④ 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4年，第 134 页

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他从叔本华的哲学观念出发，认为人生、生活本质上不过是“欲”而已，“欲望”必产生痛苦，三者互通，无从超越，文学何为？通过对《红楼梦》的解释，他提出了文学的“解脱”功能。他认为，《红楼梦》一书显示了一种人生的悲剧精神<sup>①</sup>，以文学的人生悲剧说来反对文学的道德政治手段传统。这种极富现代性的观念，与梁启超的“新民说”一起，预示着现代文学批评新时代的来临。

晚清民初也是五四文论家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成长与蕴积的时期。

陈独秀的政治生活、报人生活与文化生活从晚清就开始了。从思想上说，他秉承晚清经世之学，深受康梁维新思想之影响，已发蒙于进化论学说，完型于伦理之觉悟。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的启蒙思想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由“器用”、“制度”层面向文化观念层面演进的一个比较清晰的界碑。从《爱国新报》、《国民日报》、《安徽俗话报》、《甲寅杂志》到《青年杂志》、《新青年》，他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而且逐步形成自己鲜明的思想立场，这一立场使他在文学革命中能够把握什么是“原则性”问题，而这一问题“不容讨论”，最终确保了文学革命的胜利。

晚清民初的人生阅历不仅构成鲁迅后来的个性底色，也构成鲁迅的文化基础与精神资源。他的文论《摩罗诗力说》是几篇论文中最长的一篇。尽管它在理论上不够严密，大部分又是译编，但是鲁迅第一篇论文学的重要论文，也是中国近代以来、五四之前一篇介绍世界文学的重要论文。鲁迅所以译著此文，是痛感中国传统文化之堕落，国民精神之萎靡，而欲借异邦之新声，力图疗救国民，呼唤中国的“精神界之战士”。在此文中，鲁迅引摩罗之新声，倡摩罗诗之诗力，确立了“立国先立人”等个性主义、浪漫主义思想。其小说《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实际上具有晚清文化“先驱者”的原型特征。

当胡适高屋建瓴同时又自信地认可，“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他同时承认这不是他们几个人闹出来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他多次谈到他的成长与这段时间的经历的关系。

“~~民国~~元年，我在中国公学同学中，有几位办了一个定期刊物，名《兢业旬报》——达尔文学说通行的又一个例子——其主旨在以新思想灌输于未受教育的民众，系以白话刊行。我被邀在创刊号撰稿。一年之后，我独自做编辑。我编辑这个杂志的工作不但帮助我启发运用现行口号为一种文艺工具的才能，且以明白

<sup>①</sup> 钱中文《曲折与巨变——百年文学理论回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民国~~年 第 期

的话语及合理的次序，想出自我幼年就已具了形式的观念和思想。”<sup>①</sup>“我做白话文字，其于民国纪元前六年（丙午），那时我替上海兢业旬报做了半部章回小说，和一些论文，都是用白话做的。……自民国前六七年到民国二年（庚戌），可算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已有不满足于当时旧文学的趋向了。”<sup>②</sup>“这几十期的兢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许多作白话文的训练……光绪宣统之间，范鸿仙等办民国白话报，李辛白办安徽白话报，都有我的文字。……我不知道我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已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sup>③</sup>胡适坦言：“这个白话文学工具的主张，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在美洲讨论了一年多的新发明，是向来论文学的人不曾自觉的主张。”<sup>④</sup>

实际上，早在家乡读私塾时，胡适就读了日本小说《经国美谈》，此书是梁启超极为推崇的政治小说，胡适初读此书不过将它与其他的小说一般看待。真正体现晚清文学运动给予少年胡适影响的时间应该从上海算起。这首先体现在“文界革命”的助益。胡适阅读梁启超《新民说》后，眼界大开，开始相信在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鼓动之余，他开始做白话文，宣传启蒙思想，出自胡适之手的《兢业旬报》，有大量的白话文章在介绍科学常识的同时，更注重宣传科学的人生观，破除封建迷信，积极倡导民气。<sup>⑤</sup>其次，“小说界革命”也有一定影响。主要体现在他写半部白话长篇小说《真如岛》。由于抱着强烈的宣传意识和明确的写作意图，忽略了对艺术性的追求，并由于作者的兴趣转移，小说有头无尾的命运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日后胡适的小说创作依然具有“新民”、启迪民智的价值观，如《差不多先生传》。这些经历为后来倡导文学革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正式树起“五四”文学革命的大旗。与之相配合，陈独秀旋即在《文学革命论》中明确提出

① 《胡适书信集》，耿云志、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0年，第 190页

② 胡适《逼上梁山》，《胡适文集》第 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 157页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文集》第 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 187页

③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文集》第 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 187页

④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集·导言》，《胡适文集》第 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 157页

⑤ 徐改平《胡适早期诗文创作论》，《河北学刊》 1985年第 3期

“三大主义”，作为反封建文学的口号。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五四精英”们将“开启民智”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在外来先进文化的影响下，他们高举“科学”、“民主”两面大旗，对封建旧文学进行了决绝的批判，用极端的态度冲破封建旧文化和旧道德的束缚，是他们自觉采用的适应时代变化的文化反思形式。正如鲁迅所言：“揭出病痛，以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反封建的意识和人文主义的观念成为“五四”文学批评的根本思想；对旧文化、旧文学的变革，“立人”基础上的“立国”以及启蒙主义立场上的“改造国民劣根性”，体现“五四”时代特定的文化政治使命；封建传统文化的“权威”被逐步解构，具有现代特征的新的文化话语得以确立，这就是基于个人主义的“人的文学”观的创建。

《人的文学》发表于1918年底的《新青年》。周作人将其表述为“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他反复张扬以个人为本，反对“无我”的、虚伪的、超人间的道德，从而规定了新文学的目的在于唤醒人的觉醒。在这一观念指导下，周作人又提出了“平民文学”。这实际是“人的文学”的具体化，也是对陈独秀“三大主义”中“国民文学”的补充与发挥。他主张新文学要表现“世间普遍男女的悲欢成败”，反对表现“愚忠愚孝”、“殉节守贞”的畸形道德；而那种为社会大多数人交互实行的“一律平等的人的道德”，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真道德”。《平民文学》实际上已包含了周作人日后倾向“人生写实派”的一系列看法。周作人参与《新青年》同仁对“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批判，则是人的文学观念的具体体现。《论黑幕》和《再论黑幕》从观念上揭露了这两类小说所表现的非人的“现代的恶趣味”<sup>①</sup>。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它以探究“人生是什么”为中心，本着各自的赤诚，设计知识青年的走向，其作家大多被认为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人生写实派。封建主义文学的“瞒与骗”，是人生写实派批评家攻击的主要目标。他们力主以人生的本来面目为参照系，强调文学的“再现”功能。作为这一派的理论家，茅盾的文学批评最具代表性。他明确指出：“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而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出于这样的观念，他在评论具体作家作品时，极重视作品时代背景的真实描绘和作家对时代生活的认识程度，这与他信奉丹纳的艺术哲学与左拉的自然主义学说是分不开的。他认为《阿 匠正传》对辛亥革命的描绘“正是一幅极忠实的写照”，而郁

<sup>①</sup> 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5页

达夫的小说《沉沦》的成功在于“主人翁的性格，描写得很是真，始终如一”。他还强调“应该把文明的路指导给烦闷者，使新理想重新在他们心中震荡起来”。他之所以赞赏鲁迅小说《故乡》的结尾，是因为“作者对于将来却不曾绝望”，对于未来的“新生活”寄予了理想与盼望。茅盾重视社会——历史的现实主义批评原则，对“五四”以后的文学批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他所开创的“作家论”这一批评文体，常被以后的文学批评家与文学研究者所借鉴<sup>①</sup>。以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和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相统一的新的文学观念，彻底颠覆了以伦理文化和专制主义为基础的旧文学，实现了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饱含着个性主义内涵的人文主义，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表现的“原道”。

## 二

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发生具有直接和深刻的影响。“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了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该是更注意些的目的”<sup>②</sup>。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开放了自我，西方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思潮纷纷传入中国，从尼采、叔本华、伯格森、泰纳、罗素、杜威、弗洛伊德，西方近现代几乎所有哲学社会科学思潮都似乎在五四文坛找到同调者。在文学上，两希文学、启蒙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以及现代主义文学都引进、尝试与转化，形成了批评思想、方法与观念的多样化。从文化思想而言，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杜威的实验主义曾经使许多批评家心折，但是后来他们转向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和对世界未来图式的预言，同他的创始人对客观规律的渴求相适应，逐步和中国的现实相结合，成为主流性的思想与价值观。在引进与转化的过程中，现代文学批评不仅超越前人，同时形成了自身的现代文学精神与传统。其中，科学主义精神与人道主义精神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

“五四”新文学观的诞生，“人的文学”观念的形成，都是进化论科学思想传播和影响的结果。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在中国出版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当时风头日盛的社会

<sup>①</sup> 刘进才《文学研究创刊号：现代文学批评范式的初步确立》，《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sup>②</sup> 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小说月报》第5卷1期，1914年1月15日

文化思潮，在文学领域直接导致了“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等改良主义文学观的风起云涌。周氏兄弟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改造民族灵魂”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这种基于“人”的科学认识的文学观念，使科学恰当地契入了文学，找准了否定人的自然属性的“载道”论文学观的命脉，从而为文学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五四先驱闪耀着光芒的理论宝石中，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最为耀眼。胡适称之为“最平实伟大的宣言”。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开宗明义地强调：人是从动物进化的，“所谓从动物进化的人，也便是指这灵肉一致的人”。表明与灵肉分离的传统认识划清了界线。当时的新文学刊物《新潮》、《少年中国》、《新青年》的办刊宗旨，无不强调“进化论”观念，无不重视人的自然属性。胡适在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等著名文章中所强调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乃文明进化之公理”，成为五四文坛的时代共识。无论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念，乃至其后的“平民文学”观，还是胡适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都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影响的结果。这种基于“进化论”的文学观念必然会促成文学体裁观的更新与改变。如胡适借助现代植物学知识，将“短篇小说”特征概括为“一人的生活，一国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变迁，都有一个‘纵剖面’和无数‘横截面’”<sup>①</sup>；陆志韦借助物理语音学和比较语音学知识，对新诗体式的核心——节奏的实验。当然，一味地张扬科学而忽略民族艺术的特点，也会使科学思想走向庸俗化。在戏剧体裁上，张扬舶来品话剧的科学性时，对中国传统戏曲程式化、虚拟化的一概否定，就背离了科学的精神。科学导致文学观念的更新，也必然会影响到作家的创作，科学思想对创作的影响同时也引起批评的关注，鲁迅在介绍他创作《狂人日记》时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sup>②</sup>此话不假。作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茅盾语），鲁迅在两个方面是超前的：在艺术上的不重复，主要得力于他在广泛阅读和借鉴基础上的推陈出新；而在内容上则主要归功于他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素养。正因为他系统地研究过医学、生理学，考证并撰写过生物进化论和种系发生学说的《人之历史》，所以他在《狂人日记》、《兄弟》、《单四嫂子》、《药》等涉及医学内容的小说中，熟练地运用了生物进化理论，对病人的病理反应和诊疗过程把握得十分准确。不仅如此，鲁迅还重视科学的思想方法，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进行了成功的“移植”。比如“演绎——归

① 胡适《论短篇小说》，《胡适文存》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52年，第156页

②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50页

纳”的逻辑方法就被他转化为“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至于在鲁迅的杂文中，他随手拈来的自然科学与科技知识比比皆是。《春末闲谈》中，他借用昆虫学上细腰蜂的“螟蛉”故事，来揭露统治阶级愚弄民众的险恶用心，生动而形象；《十四年的“读经”》中，他以人体“组织变硬”和“大嚼细胞”来比喻衰老的国度被旧的习惯教养硬化，易懂而深刻。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诸如化学史上埃及的炼金术、爱迪生发明电灯、伽利略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猿人对动物的权威等等，都被他恰到好处地写进了杂文里，以此来作为自己立论或批驳的例子。同样，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中也呈现出了他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素养。闻一多早在 1924 年写的《女神之时代精神》<sup>①</sup>中就指出：“《女神》里富有科学底成分”，“诗中所运用之科学知识”和“那讴歌机械底地方更当发源于一种内在的科学精神。”郭沫若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还发表了许多大量引证矿物学、冶金学和统计学知识的论文，如《同文同种辨》、《日本之煤铁问题》等。日后，他广泛涉猎考古、文字和历史等方面的科学研究，与他自小接受和热爱自然科学无不相关。

鸟瞰五四时期作家们的知识结构，就会发现“赛先生”及科技传播对五四“新文学”的催生作用。五四作家大部分是在“新学”教育体制下培养起来的具有现代科技知识素养的现代知识分子。“五四”文学界的先驱们，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在国内就读，所学受时代风气影响，绝大部分都是自然科学。如胡适是学农的；鲁迅、郭沫若、陶晶孙、赖和是学医的；郁达夫、徐志摩、欧阳予倩、陈西滢、林如稷学的是经济；周作人学的是土木工程，张资平学的是地质学，成仿吾学的是兵器科，田汉学的是海军，李金发、闻一多学的是美术。先学自然科学后改攻文学的有冰心、洪深、穆木天等……五四时期的作家不仅学历高，知识素养深厚，而且外语水平甚高，大都掌握一至两门外语，有的还接受过外语专业训练。即使自学成才的作家（如茅盾）也非常重视外语的学习<sup>②</sup>。五四时期的作家，创作与翻译并驾齐驱。精通外语，为借鉴外国文艺理论和吸取西方科学文化精神创造了条件，也丰富了他们的素养，更新了他们的思维习惯和方式，为五四新文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丰富了五四新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五四作家生活在科学风气日甚的时代背景下，从小就接受了近、现代科学知识的熏陶与感

①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闻一多全集》（第 4 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第 157 页

② 刘为民《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4 年，第 104 页

染。“鲁迅从幼年起，就热爱自然科学，喜欢自然科学方面的书”<sup>①</sup>。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栽培植物以验证古书记载的正误。此后，他到南京和日本求学时，更是系统地学习了近现代的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对生物学、地质学、植物学和动物学方面的知识钻研尤深。从日本回国后在杭州两级师范任教时，担任的就是化学和博物科生理卫生教师。郭沫若早在家塾中，就学习了《地理》、《东西洋史》和《笔算数学》等教科书，正是这种科学知识的启蒙，他懂得物理学，才“晓得鬼神这样东西是根本没有的”<sup>②</sup>。

胡适原名胡洪骅，1891年时到上海求学。“因接触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严复译的《天演论》，开始了解进化论思想，懂得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道理。受其影响，听从二哥建议，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取名‘适之’，取‘胡适’为笔名，留美时，正式用‘胡适’为名字”<sup>③</sup>。科学不仅被人推崇，而且成为学校的必考科目和报纸副刊的必设专栏。如当时的《晨报副刊》创刊伊始，就设有“科学谈”、“卫生浅说”、“地质浅说”、“科学浅说”等栏目，并在头版头条大肆刊载文字简洁、风趣幽默的科普文章，而对“文艺创作”“并不怎么注重”。中国留美学生在1918年元月创办的《科学》杂志，“一开始就十分注重认识传播的语言通俗性和影响国民性格的思想倾向性”<sup>④</sup>，呈现出了“科学救国”的时代精神。创刊伊始，就采用横排和新式标点，开创语言形式上的历史性革新。并在“科普”文艺的创作和作家与科学思想的关联研究以及科学方法的探讨方面，卓有成效。由此可见，西方科学已成为当时的时尚，茅盾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就感叹道：“我终觉得我们的时代已经充满了科学的精神，人人都带点先天的科学迷。”<sup>⑤</sup>

五四作家自小接受的科学熏陶，影响到了他们日后的生活道路。他们不仅热爱科学，具有丰富的科学素养，而且掌握了当时先进的科学知识，养成了运用科学思维方法去看待社会和人生。为他们的文学创作立足于科学理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得他们在解剖人的灵魂、抨击封建礼教和迷信时更加深刻和富有逻辑性。诚如乔治·萨顿所说：“没有同人文学科对立的自然科学，科学或知识的每

① 周建人《鲁迅与自然科学》，《光明日报》1958年12月18日，1958年12月18日

② 郭沫若《我的童年》，黄淳浩编《郭沫若自叙》，团结出版社1985年1月，第107页

③ 王鸣剑《无希望的爱恋是温柔的》，中国长安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④ 刘为民《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01页

⑤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茅盾选集》（第3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127页

一个分支一旦形成都既是自然的也同样是人的。”<sup>①</sup>正因为五四作家自觉地掌握并运用自然科学知识为自己的创作和社会文化服务，才使得人本主义的解放和思想民主的精神在打破神学和封建迷信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五四”新文学的另一个功绩是，经过它的倡扬，人性、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在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里开始获得承认，成了维护人的生命存在和个性要求的不可小觑的精神力量。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在此之前很久，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便已开始了思想启蒙的活动。在文艺思想方面，黄遵宪以“我手写我口”张扬审美个性，认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力图突破儒家道统观念对艺术创作的限制，排除非审美因素的干扰，将个人情致的表达视为艺术审美的灵魂。他的这种观点振聋发聩，受到了文坛的重视。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称自己“夙不喜桐城古文”，不受古诗文的束缚，“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追求一种“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的美学风格。这些美学思想无疑都成了“五四”新人张扬个性自由、力摒礼教束缚的思想前提。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关于情感的思辨，也抓住了载道文学拘于理义伦常而扼杀人之性灵的要害。他认为，情感是文学的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载道文学为理义伦常所束缚，使本为情感驱动具有极强抒情特性的文学创作，成了某种道德观念的传声筒。质言之，情感的解放实质是人的解放，人性的解放。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向载道文学大胆开战，并热情推荐符合他的审美理想、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平民文学”，在这一视野中，卢梭、雨果、左拉、狄更斯等外国作家都受到他充分的肯定。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尽情地发挥了他的人道主义的美学观点。周文强调作家的创作态度，认为作家的创作应以人作为思维中心，以人的生活为是，以非人的生活为非。该文还对中国的旧文学的非人的特性作了系统的解析，对西方文学的人道主义的传统作了全面的介绍。周文关于人道主义的文学态度与旧文学观念的对立是一目了然的。鲁迅最初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所秉持的也是人道主义的立场。《狂人日记》以吃人的礼教作批判的鹄的，多方挖掘，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的悖谬。《孔乙己》则怀着深切的人道同情，刻画了一位受封建的思想意识腐蚀与戕害的下层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他的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之节烈

<sup>①</sup> 乔治·萨顿《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陈恒六、刘兵等译，华夏出版社1983年，第180页

观》等也清晰地昭示了其时鲁迅对封建社会中人之命运的文化思考与美学思考。我们注意到，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理想中，也一样包含了人道主义的因子。李大钊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sup>①</sup>从“历史是人间普遍心理的纪录”这一基本立场出发，他将19世纪的法国革命与20世纪俄国革命都无一例外地看做是“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必须指出的是，该文是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因此，李氏将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提并论，表明在他的心目中，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是同等程度的概念，信仰社会主义也必信仰人道主义。事实上，拿当时的中国的国情看，宣传社会主义与进行人道主义的思想启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确实是互为补充的。在关于文学的思辨中，李大钊张扬“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sup>②</sup>，其人道主义的美学趣味了然可见。

20年代初期，中国新文学承“五四”人道主义宣传的惯性，继续在各个方面表达文学新人的人道主义的美学理想。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宣言表达了研究会同人服务人生的美学旨趣。茅盾以朗损的笔名发表《社会背景与创作》，提倡“怨以怒”的文学，即“于同情于被损害者外，把人类共同的弱点也抉露出来”<sup>③</sup>，这一文学宗旨的人道主义性质我们是不难发现的。郑振铎以西谛的笔名发表的《新文学观的建设》一文，在表述其文学主张时，也把人道主义作为主要的思想参照，他说：“文学是人类感情之倾泻于文字上的。他是人生的反映，是自然而发生的。他的使命，他的伟大的价值：就在于通人类的感情之邮。诗人把他的锐敏的观察，强烈的感觉，热烘烘的同情，用文字表示出来，读者便也会同样的发生出这种情绪来。”<sup>④</sup>创造社是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但在创造社同人的文学主张中，我们照样也看到了执著用世的人道立场。例如，成仿吾阐述创造社文学宗旨的《新文学之使命》认为，文学应对社会的“不公的组织与因袭的罪恶”加以严厉的声讨，并把这视为文学家的责任。他说：“一个文学家，爱慕之情要比人强，憎恶之心也要比人大。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便应当是良心的战士，在我们这种良心病了的社会，文学家尤其是任重而道远。”在分析当时的社

① 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

② 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星期日》社会问题号，1918年5月15日

③ 郎损（茅盾）《社会背景与创作》，《小说月报》第4卷第4号，1913年4月15日

④ 西谛（郑振铎）《新文学观的建设》，《文学旬刊》第3期，1918年5月15日

会情势时，成仿吾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弱肉强食，有强权无公理的时代，一个良心枯萎，廉耻丧尽的时代，一个竞于物利，冷酷残忍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的组织，既与这样的时代相宜，我们的教育又是虚有其表，所以文学家在这一方面的使命，不仅是重大，而且是独任的。我们要在冰冷而麻痹了的良心，吹起烘烘的炎火，招起摇摇的激震。”又说：“对于时代的虚伪与它的罪孽，我们要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我们要是真与善的勇士，犹如我们是美的传道者。”<sup>①</sup>足见人道主义在五四时期呈现出丰富的话语形态。

胡适总结新文学的发生及其历史价值时，简要概括为此时期的文学是“活”的文学与“人”的文学，是十分精辟和准确的。然究其深层原因，与“进化论”、科学主义的兴盛以及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密不可分。

### 三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文体有其鲜明的特色，但也有明显的局限。例如，在体制上，主要用诗话、词话、书信、序跋等札记型体式，虽然短小精悍，但很难容纳博大恢弘的理论；在思维方法上，用整体感受的领悟式、直观式的形象思维，在理论深度的探索上受到限制；在语言上，用的是文言体，影响了理论的传播和普及，等等。到了近代，古代文论文体逐渐发生了演变，出现了多样化、大容量的体式，完美精致的篇章结构，通俗浅显的语言文字，自由舒畅的语言风格，融会贯通中西批评方法的文学理论批评方式，外在形式也逐步规范化。古代文学批评文体向近代化、正规化发展<sup>②</sup>。

近代文学理论批评文体的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一、同治前后（1862—1895）：传统文论文体蜕变期；二、戊戌维新思潮兴起前后（1895—1911）：报章文体影响下文学理论批评文体剧变期；三、革命派与保皇派论争前后（1911—1919）：文学理论批评文体争论探索期；四、辛亥革命前后（1911—1919）：文学理论批评文体走向中西融合期。上述四个时期界限的划分是模糊的，各个时期之间亦有所交错。经过这四个时期，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时（1919—1949），文学理论批评以白话文为突破口，全面突破旧的形式，迅速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文体转变。

① 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创造周报》第 8 号，1928 年 5 月 10 日

② 王群《五四新文学运动前二十年文学理论批评文体的演进》，《复旦学报》2003 年第 3 期

近代文学理论批评文体的新变，大致从同治前后露出一些萌芽。这些萌芽首先是从诗话、词话、序跋、书信等传统文论文体开始。

给文学理论批评文体演进以重大影响的，首先当属戊戌维新时期风行起来的报章文体。

报刊业的发展与成熟过程中酝酿着文学理论批评文体的变革。1898年上海《六合丛谈》月刊的出版和1896年《申报》的创刊，标志着中国报刊的成熟。《六合丛谈》除了宗教、科学、新闻以外，也刊登文学作品和评论。创刊号就有英国人艾约瑟写的《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还介绍了荷马史诗、希腊三大悲剧和亚里斯托芬喜剧。《申报》是第一张以市民为读者对象的报纸，文体偏于“今”、“俗”。王韬是近代报章文体的开创者。他于1868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发表多篇“社说”和其他政论文，目光远大，立论深刻，其文体“飞毫濡墨，挥洒淋漓，如我怀之欲吐”<sup>①</sup>，放言直抒，用语浅近，不假修饰，段落不求对称，篇幅不拘短长，突破了旧文体的桎梏，开报章体之新风。

对报章文体作出最重要贡献的是梁启超。在他提倡、推广并身体力行下，报章文体在全国蔚为风气，文学理论批评文体也获得长足发展。

梁启超极为重视报章宣传。他认为报章可以“向导国民”，而欲使报章担当起这一职责，就必须使用“新文体”<sup>②</sup>。从《时务报》创刊到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写了六十多篇文章，积极宣传变法。这些文章立论新颖，感情充沛，文气华美，流畅自然，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被称为时务文体，又称为新文体、报章文体。

梁启超的新文体开一代文学理论批评文体之新风。这可以从以下两点来看：第一，梁启超从政治角度立论的直抒胸臆、洋洋洒洒的文学理论批评，尤其是小说理论批评，使得社会上小说批评文章蜂拥而出。这些文章一方面从立论的角度模仿梁启超，强调小说功用，提升小说地位，即使是持不同的观点，也是从梁启超的出发点来立论。另一方面，许多人专从文体上模仿梁启超，正如郑振铎说：“他能以他的‘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作风，打倒奄奄无生气的桐城派的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sup>③</sup>第二，梁启超首倡探讨小说理论

① 邬国平、黄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上）》，江苏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174页

②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清议报》第150册

③ 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传》，《郑振铎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74页

的“小说话”形式，开小说理论研究之风气。梁启超主编《新小说》时，开设了“小说丛话”专栏，用连载的形式，发表了数十位小说批评家的小说专论，产生了一种类似诗话、词话体裁的“小说话”。这是一种新旧结合的文学理论批评形式，文章可长可短，内容可深可浅，形式可繁可简，适应处在新旧转型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家的口味，不少人一用就得心应手。

于是，这一体裁形式立即像宋代的诗话一样，勃然而兴。据粗略统计，当时较为著名的“小说话”一类的著作有三十多种，其中一些小说话（如管达如的《说小说》、吕思勉的《小说丛话》）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转变成小说理论批评的长篇专著。可以说，在梁启超新文体的影响下，小说理论批评从不为人们所重视的评点体一改而成为文学理论批评中最富有理论色彩的样式。

在报章体影响文学理论批评样式的同时，近代白话文运动也蓬勃开展。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长江中下游地区白话文报刊大量涌现，白话书籍（主要是白话小说）大量出版，白话文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近代白话文运动是在以梁启超为旗手的“文界革命”大环境中，作为“文界革命”的一部分发生、发展起来的，同时又对文界革命的各个领域，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戊戌维新思潮兴起后，在报章文体的影响下，文学理论批评文体向通俗方向发展。但其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文章动辄上万言，叠床架屋，浮而不实，一时形成新的流弊。针对这种状况，一些文学理论批评家试图在文体改革的潮流中，为文学理论批评文体的变革探索其他道路。其主旨在于维持文言文形式，在旧的语言文体中，体现新的文学理论批评内容。以严复为代表的“先秦文”文体，以章炳麟为代表的“魏晋文”文体，均为这种努力的结果。戊戌年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争前后，“报章文”、“先秦文”、“魏晋文”等几种不同的文体的提倡者之间，先后多次发生过争论，对文体改革的进程颇有启示。而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以长篇论文的形式建立起系统的理论框架和批评坐标，开启了文学批评理论系统化的风气。他还借鉴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和文学批评的观念方法来评论古典文学名著，阐发其思想意义和自己的审美感悟，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从以往自我封闭承继演进，开始走向中西汇通交融的开放性发展，为现代文学批评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sup>①</sup>。

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文体经过四个时期的演进，到新文学运动中，终于发

<sup>①</sup> 赖大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